

# 1993—1994年：中心城市稳定性分析与预测

## 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

“零点调查”的中心城市稳定性研究,被作为城市内部核心因素考察可涉及4个方面:市民对通货膨胀的心理承受能力、公共治安安全感、城市人群间的协调程度、对公共管理体制的关注程度。象宗教民族问题、政治权力格局的异动、突发性社会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尚未能进行研究。“零点调查”的基础研究资料是公司1993年在京津沪等地实施的9项专项民意调查结果。1993年8—9月,我们与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等单位合作,通过严格的抽样控制,派出访员,在京津沪三市,访问了1650户(每市各550户)市民家庭,回收有效问卷1539份。

我们的研究表明,1993年中心城市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社会稳定性,有助于市民稳定的社会因素有明显增长,现存的城市内社会不稳定因素及其消长态势集中于管理体制的举措上。在与现有水平接近的动态及社会人群上访动向研究分析,虽然这方面的隐忧存在,但在1994年出现爆发点的可能性较小。中心城市间相比较,内地中心城市出现有限度的不稳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可以认为,中心城市目前的稳定性主要来自于4个方面:①居民对于社会变动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增强,宏观改革取向的社会认同程度很高;②居民对于社会变动的应对实力增强,手段增多;③政府对中心城市稳定的特殊重视与关注;④在经济市场化的新水平上,中心城市在其发展中获得中小城市和农村发展所没有的特殊的经济机会。相应地,不稳定因素主要隐藏在4个方面:①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管理意识与管理方法无法发挥效能;②市民意愿与政策动机脱节;③经济利益分配不公激起社会不满;④缺乏对高经济发展速度所导致的社会成本支出的代偿手段。

一、1993年通货膨胀压力沉重,但市民总体感受未至极限,市民消减通胀压力的渠道增多,市场较为稳定。1994年市场物价涨幅相当于或略高于1993年水平,若鼓励市民进一步拓宽合法的创收途径,切实关注创收能力弱势阶层的呼声,那么由涨价引起的社会波动的可能性就不大。

三市居民对通货膨胀程度的总体评价趋于“较严重”。调查表明,六成多(61.92%)调查对象认为目前我国存在着“很严重”或“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认为严重程度尚属“一般”者占22.22%,认为“不太严重”者仅占6.43%,几乎无人认为“不存在”通胀现象。在调查对象目前最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中,“通货膨胀”问题居于第5位。

调查结果还显示,认为“物价上涨水平快于收入增长”者占绝大多数,三市综合结果为74.89%。虽然在客观上,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要快于物价的上涨,但由于物价增幅较快,且三市调查对象对涨价感受最深的几种商品(主副食;房租、水电、煤气费;医疗保健费;子女学杂费;服装鞋帽),均在日用必需消费领域,因而居民形成较严重的负增长感受。有1成多报告收入水平尚低于1992年同期水平者,生活质量有可能因物价的上涨而受到较严重的消极影响。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现行通胀水平总体未过市民承受能力,但也有近 15%的居民已届或近于无法承受现在的物价涨幅。这一结果的支持证据来自 5 个方面:

其一,六成市民认同通胀是一种自然现象。认为“通货膨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快速转变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30.03%)和“通货膨胀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的问题,是一种正常现象”(29.17%);有 27.73%的人指出通胀产生的根源是“管理体制落后的产物”,另有 13.07%的人认为“通胀是社会主义经济国家不应有的现象,是违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创收能力弱势阶层(离退休者、部分国有单位从业者、在大多数教学科研单位供职的知识分子)主张这一观点的比例较高——他们是通胀条件下和传统的福利体制削弱后最大的失利而又较欠缺自救意识和能力的群体。

虽然,大多数市民承认现行通货膨胀的严重性并抱有相当普遍和严重的不满,但对经济改革前景的乐观性则将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能把目前的通胀只是当作一种暂时的困难来对待。本次调查表明,三市中除占 19.30%的人表示“说不清”外,表示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信心者共占被访者总数的 64.58%;“信心不足”以至“没有信心”者占 16.04%。

其二,现行涨价水平未超出绝大多数居民对日常生活一般消费项目的价格承受能力,但明显妨碍居民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调查设计人员把居民需要支出的项目按衣、食、住、行、娱乐、教育等分成 2 组 7 大类,第 1 组列出的是为维持日常生活,如日常主副食品、公房房租、公共交通、水、电、燃气、子女一般教育、普通服装所必需的支出项目的价格的承受能力;第 2 组是对为提高生活质量,维持较高水准的生活,如在外就餐、商品房、出租车、子女特殊培训、时装、娱乐保健等支出项目的价格的承受能力。调查结果,在第 1 组中每一支出项目均为选择“完全可以承受”者为最多,都超过了半数,说明以目前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实力,维持一般或现有水准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其中 30—40%左右的居民对维持一般水准生活感到勉强,继续涨价对这部分市民的现实威胁最大。平均还有近 4%的市民连最一般的日常消费价格都表示“无法承受”。由于现行涨价水平未突破 95%以上市民的日常消费承受能力,故在与样本区域生活水平接近的城市因此而出现对抗性社会冲突的可能性极为有限。

其三,八成居民对物价继续上涨有充分预期,突发冲击市场的可能性有限。从三市综合统计结果来看,只有 8.98%的居民认为物价有下降或保持稳定的可能,除 11.13%的人“无法判断”外,其余 80%的人认为物价的上涨趋势是必然的。其中认为“稳中有涨”者比例(43.42%)略高于认为“持续上涨”者比例(36.46%)。

其四,居民消费选择的理性水平提高,使盲目的保值消费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降低。调查数据显示,过半数居民在重要消费行为方面是有计划的、选择性很强;即使原有的消费计划有所变动,但很少有人会转而采取盲目的市场争购行为;居民在通胀对策的选择中,“依靠个人努力增加工资收入”高于对政府措施和单位帮助这两种对策的选率。

这次调查特别了解了市民对现有水平的通胀引发类似 1988 年的抢购风潮的可能性的评价。从三市综合统计结果来看,过半数者(51.47%)认为“不大可能重现”,认为“很有可能重现”的仅占 12.57%,另有 35.96%表示“说不准”。地区间比照分析说明,上海地区认为“有重现可能”的最多,为 14.74%,北京市民倾向于“不大可能重现”者最多(54.79%)。

最后,多项综合因素对淡化居民近期消费冲动起了重要的牵制。住房改革、子女教育等中长期预期对支出计划的节制;经济秩序不稳定对风险投资行为的牵制作用;在一般消费品较充分持有的基础上新型消费领域仍比较狭窄;利率上调等因素都直接对市民消费心理起到了稳

定的作用。本次调查表明,大多数居民在目前形势下更愿意将货币收入存入银行。与1992年同期相比,居民报告储蓄额上升者的比例高出报告下降者的比例。这一调查结果不仅得到本调查中有关最佳保值手段的结论的支持,也得到国家统计局1993年7、8月份居民储蓄额变动情况的统计结果的佐证。

按照目前的经济走势,1994年物价涨势仍难遏制。1994年市场物价的涨幅总水平如高于1993年的水平,只要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感到难以维持的群体不超过市民总量的5—6%,对物价上涨水平感到难以承受的人群低于市民总量的18—20%,则保持与目前接近的城市市场稳定水平,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1993年市民公共安全感总体水平处在“较安全”状态,但现有治安保障体系的漏隙进一步扩大,治安隐忧增多。1994年在稳步发展社会化的治安保障体系方面有所进展,加强对警察行为的监督,则仍可使社会治安状况维持在现有水平上。

1993年4月,“零点调查”与中央有关部门合作进行的“北京城区居民公众安全感调查”(500样本)结果显示,除有28.4%的人表示“一般”外,47.20%的居民认为在其所处的社会治安环境中感到“比较安全”,8.20%的调查对象则认为“很安全”,两者合计达55.4%;感到“较不安全”和“不安全”的占16.20%。在一个5级量表上,如以1表示“很不安全”依次递增至5表示“很安全”,则本题实际均值为3.453(标准差为0.909),高于中值3,表明调查对象对治安环境的总体感受偏向于接近“比较安全”的水平。

从性别来看,男性选择“比较安全”和“很安全”的比例(占男性的53.8%)略低于女性(占女性的67.57%);从年龄来看,安全感水平最高的是60岁以上组(占67.57%),感觉“不安全”最突出的是50—59岁(占21.05%);从文化程度来看,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的差异并不明显。

选择“较不安全”和“很不安全”项的居民在市民总量中也有一定规模。感觉“不安全”的主要原因依次为:本市流动人口过多(29.63%);曾受过不法侵害(19.75%)和家人曾受过不法侵害(12.35%)。首选项“本市流动人口过多”,表明外地进京流动人口对北京市民传统生活环境和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公民在财产权方面的不安全感较为突出。根据北京市调查对象对过去一年中所受违法侵害的报告,侵犯财产权的案件(盗窃、抢劫、诈骗等)最为突出(占报告的违法事件的30.36%),排在调查对象“最担忧的一类治安事件”前5位的是:盗窃(60.40%)、交通事故(43.40%)、抢劫(20%)、火灾(18.20%)和赌博(11.60%)。

“零点调查”对京津两地分别在1993年4月和8月进行的市民财产安全感调查表明,两市各自约近80%的居民部分或完全同意“有财不要外露”的说法。较高收入阶层(400元以上)害怕生人造访率远高于其他阶层;高收入阶层(800元以上)对发展私人侦探保镖业的态度远比其他阶层热心;较高收入阶层(400元以上)的财产公开性程度低于低收入阶层。

这次调查还发现,市民基本肯定司法机关在阻止违法中的作用,在社会治安事件中的互助意识也较强。近六成居民对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表示担忧。15%的市民完全否定司法机关在阻止违法中的作用;9.29%的市民认为警察完全不可信;调查对象报告发生的违法事件数与立案数、破案数之间的差距较大;36%的市民支持发展私人侦探业;22.60%的市民支持发展私人保镖业。

我们于同期对外地进京工作人口进行的一项调查(600样本)显示,3/4的调查对象感到“较安全”和“很安全”,只有7%的人感到“不太安全”或“很不安全”,总体水平在“较安全”上。

在城市人群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传统司法机制的局限性将会越来越明显。1994年城市居民对治安环境持安全或较安全感受的仍可保持在50%或略高。要适应社会结构进一步变动的需要,维持现有的治安水平或有一定的改善,则应在改革司法机构,加强其办事效率,改变其传统行为方式,进一步利用社会力量,加强社会化的治安保障体系,发展私人治安产业等方面迈出步伐。作为对市场经济发展成果的保障,对于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应有更为有力的措施。

三、1993年城市人群构成中,外来人口比例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部分外来人口已成为相对稳定的城市居民。外来人群总量尚未越城市人口容量,其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但对城市管理体制的冲击较大。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间的矛盾也很突出。1994年在对外来人口的社会组织与控制上有所进步,尚可容纳稍多于现有量的外来人口。

人群流动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的流动,导致中心城市内相对稳定的居住人群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零点调查研究人员根据该公司1993年5—8月实施的“京沪居民消费心理调查”结果,将现在的两市实有人群分成4类,即高流动人群(观光旅游、短期商务活动人员)、低流动人群(在城市就业的外地农民工、外地商住人员)、高稳定人群(有本市户籍且在本市工作的居民)和低稳定人群(有本市户籍但在地工作的居民)。以北京城区为例,上述4种人群的比例约为1:1.8:6.5:0.02;上海约为1:2.5:3:0.05。

根据有关部门掌握的数字,从1978到1992年,北京市的外来人口数由原来的30万人增加到150万人,其中仅取得暂住权的就已有100万人。按照我们1993年4月与劳动部门等单位对外地进京人口合作进行的调查,有45.57%的外来人口无暂住证,可推算出目前北京地区的外来人口应有134万人左右。外来人口中35岁以下人口占39.5%,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35.03%,到京一年以内者占49.02%。目前他们主要的就业领域为服装与日用百货销售(17.05%)、餐饮(17.70%)、农副产品购销与加工(12.95)、建筑装饰(12.30%)。

外来人口对城市稳定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总体经济收入较低(平均约在215元左右,约45%的人收入在200元以下,对这一数字的意义的估计应考虑外来人口的支出结构与经济负担特点),劳动与生活保障条件较差,对城市生活方式不适应,业余调剂活动缺乏或单调,工作或居所不稳定,与城市人群间比照后的心理不平衡,因而,生活稳定性较差。第二个方面,由于外来人口的流动性和无组织性,也给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工商行政、税收等带来了特殊的挑战。以原籍地域为主要标志形成的外来人口社区与非正式社会组织的管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据有关资料,在北京25万从事各种经营的外来人口中,无照经营者占30%以上,在北京地区的罪案中,外来人口的现行罪案比例在40%左右,在外来人口聚居区更高达70%以上。我们的有关调查结果显示,承认在过去一年中曾在北京与人争斗过的占外来人口总数的17.4%,其中主要是与北京市民(38%39%)、不明身份者(19.44%)、其他地方外地人(17.59%)和管理人员(13.89%)。第三个方面是与当地居民间的抵触情绪。北京当地居民感到外来人口过多是他们感受不安全的主要原因,而外来人也有60.16%的人程度不等地感受到北京人的歧视,有11.64%的人认为“受到很严重的歧视”。

调查表明,占调查对象总数65.91%的人准备在北京长住或几年后再考虑去留问题,表明大多数现在北京的外来人将成为北京城相对稳定的住民。而根据外来人口流动的滚动效应,1994年应当至少有40—50万左右的新人口流入北京。虽然,在就业和人口容量上,新的外来人口本身还不会成为导致社会动荡的导火线,但在外来人的聚居社区管理与混杂人口的管理

上,应有更积极的措施。由于目前的管理体制缺陷,应特别对外来人群中带有黑社会色彩的组织化形式加强控制。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社会组织、市政建设和外来人口的参政问题也应有所对策。

四、1993年市民公开表达对公共管理事务的真实关心的环境条件并不理想,对改善物质生活质量予以高度关注。下半年,因政府反腐败的政治动员,对反腐败工作的期望值有所提高。不论反腐败斗争的最终结果如何,以往的经验积淀将使市民不会对此做出强烈的反应。但需要形成政府与市民间的新的政治沟通机制,以在价值观念更为多元化的条件下,较为准确地反映主流民意和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在这方面,中介团体发挥作用的余地很大。

在我们与中央有关部门在1993年4月对北京市民进行政治安全感的调查时,调查对象在回答“您是否爱谈论您个人完全真实的政治见解”时,表示“很爱谈论”占总数的11.48%;“分场合,有时爱谈论”的占46.27%;“很少谈论”的占总数的30.60%;“不谈论”的占总数11.11%。

通过调查结果分析,调查对象中“分场合,有时爱谈论”的人比例最高。其中男性“很爱谈论”的比例(占其总数的14.17%)比女性的比例(占其总数的9.49%)高;40—49岁年龄组的人“爱谈论”的比例比其他各组为高;不同文化程度间的调查对象在“爱谈论”选项上的选择频率十分接近;从职业来看,“爱谈论”群体在个体私营业主(占其总数的20%)和党政机关干部(占其总数的16.67%)中的分布高于其他职业阶层的平均水平。

这项在年初进行的调查通过本调查问卷中设定的“您最关注的一项社会问题”的回答情况分析,“很少谈论”或“不谈论”政治见解的比例偏高(42%),也许是因为许多城市居民最关心和谈论的是与日常生活(物价、工作变动)、孩子教育(文化教育)、人身财产安全(治安秩序)等眼前需要最密切相关的事情,而对政治问题的兴趣相对不高之故。

除了“很少谈论”和“不谈论”政治见解比例较高这一点以外,占调查对象总数57.40%的“很爱谈论”和“分场合爱谈论”者的主要谈论场合是在家中(占这类人总数的57.73%);在“很爱谈论”者中,排在大多数人第1位的谈话对象是“知心的熟人、同事、街坊”(占本类人总数的69.49%)和家人亲戚(11.86%),而且占调查对象总数77.80%的人表示“不会在有陌生人的场合发表自己真实政治见解”。交叉分析结果显示,越是表明“爱谈论个人真实政治见解”的人,越是可能在陌生人的场合也发表这类见解。

在我们1993年9月初完成的对京津沪三市1500名(每市各500名)市民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中,向调查对象列出了目前具有热点效应的22项社会问题供选择。据对有效回收问卷的统计分析,被排在前5位的社会问题是:住房改革(14.77%)、廉政建设(11.05%)、工资改革(10.66%)、价格改革(10.44%)、通货膨胀(10.01%),排在6—10位的问题是:子女教育(7.73%)、社会治安(6.63%)、贫富分化(5.52%)、申办奥运(4.89%)、社会保障(4.42%)。

分市统计数据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北京市民最关注的5个社会问题是:住房改革(15.96%)、廉政建设(11.28%)、价格改革(11.16%)、工资改革(11.16%)、通货膨胀(9.52%);上海市民最关注的5个社会问题是:住房问题(14.13%)、通货膨胀(13.99%)、廉政建设(11.49%)、价格改革(11.02%)、工资改革(10.23%);天津市民最关心的5个社会问题是:住房改革(14.39%)、廉政建设(10.49%)、子女教育(10.36%)、价格改革(10.04%)、工资改革(9.91%)。

第一,经济改革与经济形势的动荡,更加剧了居民对与收入水平、价格指数的上涨、保值需

要、社会保障有关问题的关注。房改期待作为一种为最多市民关切的问题,目前对牵制居民储蓄与公有体制内人员流动,具有重要影响;物价持续上升与近期对金融秩序的整顿,使得物价改革、通胀、工资改革(在很大意义上也包括房改),成为“滚烫的话题”。第二,近期市民关注点的变化与官方自觉不自觉的政治动员有关,例如廉政建设问题,上述结果表明,由年初5—6的位置上升到第2位,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反腐败动员而提升了公众的期望值。而象教育问题与1993年上半年的宣传相比,有所淡化,因而位置也由年初的第3位显著移后。研究人员认为,在同为公众关注的问题中,宣传会导致具体问题的变化。但宣传本身并不一定能炮制热点,如持续而全面进行的“申办奥运”宣传,并未使其成为核心热点。第三,社会问题的分布具有地区特点,从而在一些市民关注点上形成差异。例如,三市中的价格上升指数以上海为最,北京居次,天津最低,因而,“通货膨胀”问题在上海居第2位,在北京居第5位,在天津居第6位。

中介组织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后,发挥利益群体内部及与其他利益群体间的协调者的角色,担当非常重要的功能。但是,在我们于1993年对全国城市私营企业发展状况等调查中,发现虽然半官方的群众团体荣誉性色彩有一定减少,但在新条件下变相的机关化或经济实体化的问题很突出。因而,其真正的社会“中介作用”很弱,还很难充当维护稳定的协调机制的重任。

市场经济下公共管理机构越来越多行使宏观调控的职能,这实际上就提出了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管理工作更高的要求。但我们在1993年4—5月与人事管理等部门对中央国家机关35岁以下担任公职的青年知识分子流动意向进行调查时,表示有流动意向者占调查对象总数的74.08%,欲流动的主因是“收入待遇不佳”和“专长得不到发挥”;41.18%的调查对象对公务员制度推行后改善自身境遇表达了“很低”或“较低”的期望。公共管理品质的高要求趋势与管理机构中的精英流失加剧正构成尖锐的矛盾。

相对来说,市民对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与经济改革一样,看重实效。象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建立、反腐败等各方面,与公众的期望有较大的距离。我们与北京大学法律系合作在四川成都进行的《行政诉讼法》实施效果调查表明,近三成居民不知道该法的存在,知道该法的居民对该法内容的平均了解率不到2/10,受访者对该法实施的作用与前景基本持肯定态度,但持不确定评价者人数也很可观。受访居民报告在过去一年中遭受行政侵害的比率高达近四成,较多的居民已开始谨慎地考虑将行政诉讼作为受到行政侵害时采用的救济途径,但调查对象对何为胜诉的关键分歧较大:50%的人认为是“诉讼理由在法律上成立”;21.90%的人选择“有各种关系影响审判人员”;占15.80%的人认为是“舍得花钱打点路子”;认为应为“能请到一位好律师”的占8.6%。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993年社会经济形势中的许多不稳定因素植根于公共管理体制的不适应性。1994年将要出台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的成败关键是加快管理体制的改革,减少社会重大不稳定因素。但在1994年的此类改革中,应注意采取低调实效的策略。在这方面的无功之举一般虽不致直接导致社会不稳定,但会进一步降低政府的道义号召力,降低其作为社会稳定的组织者的动员能力。预计在1994年的市民关注热点中,对公共管理体制(政治问题,包括反腐败问题)的关注的总体水平将有所上升,预计将排在4—5位的水平上。

1993年12月

作者:袁岳 马旗戟 刘盈 范文 余茜 赵慧 陈远达

责任编辑:张宛丽